

丹珠文存

丹珠昂奔 著



卷一下

藏族文化发展史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

丹珠昂奔 著

丹珠文存

卷一下
——藏族文化发展史——

DANZHU
ANTHOLOGY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丹珠文存 卷一 (上下册) / 丹珠昂奔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7-5660-0371-3

I. ①丹… II. ①丹… III. ①藏族—民族文化—文化史—中国
IV. ①C53②K28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36117 号

丹珠文存 卷一(上下册)

著 者 丹珠昂奔
责任编辑 雨 山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69.25
字 数 12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60-0371-3
定 价 208.00 元(上下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藏族文化发展史

卷一（下）

第三编

藏传佛教文化时期

(8 世纪下半叶 ~ 20 世纪中叶)

引 言

以桑耶寺的建立为标志，佛教正式立足吐蕃，在赞普和王室的支持下，使之在短短一段时间内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藏族文化的流向也自此更向，从而造就了藏人千余年来的信佛、崇佛状态。

吐蕃王朝崩溃不久，藏族社会便进入了漫长的分裂时期。分裂时期是以统一王权瓦解后的悉勃野家族的王子王孙们的分裂割据为滥觞的。或者说王系割据对于后期的分裂状态，仍有过渡性质。因为王子王孙们的相互攻伐是想获得新的统一的王权，但是这一状态从此再未出现，代之而起的是以教派为特点的地方政治割据势力。这些势力虽然图求政治的统一，但更注重发展本教派力量，企图通过本教派的力量来统辖全藏。因而壮大本教派成为各派地方势力的神圣使命，藏族社会也由政治割据进入教派割据的时期。这一时期可以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藏传佛教复兴期（公元10世纪）

历史有许多自身发展的共同因素。藏区有两次割据状态的出现与中国境内的大气候相一致。一次是公元10世纪李唐王朝为农民起义所摧毁，形成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代（公元907~960年），产生统治中原的梁（907~923年）、唐（923~936年）、晋（936~947年）、汉（947~950年）、周（951~960年）五朝，有了环绕中原地区的吴（892~937年）、南唐（937~975年）、吴越（893~978年）、前蜀（891~925年）、后蜀（925~964年）、南汉（905~971年）、楚（896~951年）、闽（893~945年）、南平（907~963年）、北汉（951~979年）等十国。统称五代十国，相互兼并，战火连绵。而吐蕃的人民起义，起于公元9世纪70年代，延续20余年（869~895年以后），达玛吾都赞子云丹、欧松及其子孙相继在卫藏地区建立阿里王系、拉萨王系、亚泽王系、雅砻觉阿王系，朵康地区则形成稍后（11世纪）的唃廝囉政权（王系）和同为藏人系统的西夏王朝。除此之外，吐蕃人民起义后，还形成了以没庐、属庐氏为首的藏堆，以娘氏、朗氏为首的许列莫，以卓氏、玛氏为首的彭波萨丹木，以涅氏、琛氏为首的上雅砻，以尼瓦氏、苏布氏为首的洛扎丹秀，以库氏、涅氏为首的穷结以及多布、工布、列、拉萨等11个地方势力。朵康地区还有一些小的地方割据势力。一则是清末民初

的军阀割据时期。从时间上看，这种现象的出现都与旧王朝的解体，新的统一政权尚未建立或新政权尚立足未稳有关。

藏传佛教的复兴，其主要代表事件便是上路弘法（ཉན་པ་ཐུང་ཁྱེད་འདུལ་པ།）和下路弘法（ཐུང་པ་ཐུང་ཁྱེད་འདུལ་པ།）。据藏文典籍记载，朗达玛灭佛后，100多年中看不到穿袈裟的僧人。下路弘法是指朗达玛灭佛时，卫藏僧人藏饶赛、约格琼、玛释迦牟尼三人辗转逃到了安多之宗喀德康（མཇུག་ཁ་པར་ལྷོ་ཁུལ།，在今青海省循化县境内）地方，该地有一叫穆苏赛拔的青年要求出家，此人便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喇钦·贡巴饶赛（892~975年）。后喇钦学成，以丹底（དན་ཁྱིལ།）寺为据点，授徒传教。后出自王室的西藏山南桑耶寺主意希坚赞派卢梅·楚臣喜饶等十人到喇钦处学经，学成后返回西藏，广收门徒，修建寺院，使佛教再度兴起。

上路弘法是指朗达玛后裔建立古格王朝的柯日（意西沃）由于虔信佛法，曾派21名有培养前途的青少年到克什米尔学习佛法，其中19人不适气候而死，唯以后成为大译师的仁钦桑布（958~1055年）和玛·雷比喜饶得以生还，翻译许多佛教经典。意西沃还请当时著名的印度超岩寺的住持、孟加拉高僧阿底峡（982~1054年）来藏，在古格托当（མཇུག་ཐོང་།）寺传教授法，写成了《菩提道灯论》。阿底峡入阿里传教成为上路弘法的重要标志。

经过上路弘法和下路弘法后，藏境佛教得以复兴（一些文章以978年建立托当寺为标志），为后期藏传佛教诸教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教派形成期（11世纪中叶至1121年）

一般讲教派形成期应为11世纪中叶至15世纪，即以11世纪中叶赛保且（1003~1064年）建俄巴隆寺，立宁玛派始至1409年宗喀巴建甘丹寺，立格鲁派为终。另外可将其下限定为1121年，即宁玛派建立之后，1056年，仲敦巴嘉吾穷乃（1005~1064年）修热振寺，立噶当派；1093年，昆·贡却杰布（1034~1102年）修萨迦寺，立萨迦派；1121年，琼保南交巴（976~？）和塔布拉杰分别建香雄寺和岗保寺，立香巴噶举和塔布噶举派。至此，藏传佛教的四大主要教派宁玛、噶当、萨迦、噶举建立，实际上一般意义上的藏传佛教主要教派业已形成。那么，为什么不将15世纪后在藏族社会起到主导作用的格鲁派包括其中呢？众所周知，噶当派源于阿底峡，仲敦巴是阿底峡的弟子，奉行阿底峡所倡佛语、佛典是僧人修法成佛的最高准则，行为持守，无一例外。此后噶当派分为教典和教授两派，宗喀巴建立格鲁派后：（1）仍推崇阿底峡，倡导严守戒律，僧俗有别；（2）宗喀巴七岁时在夏琼寺（今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查甫乡）正式出家，拜该寺寺主噶当派僧人顿珠仁钦为师，故其师承为噶当派；（3）由于以上二原因，宗喀巴创建格鲁

派后,噶当派自然地归入此教派,不复单独存在;宗喀巴自己称其教为“新噶当派”; (4) 噶当派主要是学习显宗的,但也学习密宗,从修习次第上,主张先学显宗后学密宗,依照阿底峡《菩提道灯论》规定,密宗经典需学作、行、瑜伽、无上瑜伽四部,格鲁派基本沿袭了此类做法,使之更加系统化,强调先显后密,显密双修的修习原则;所学基本经典也大体相似。因此将格鲁派作为噶当派的进一步延伸是在乎情理,无之为过的。

第三阶段,教派执政期(13世纪初至1354年左右)

古今中外,宗教参与政治,追逐世俗权力者屡见不鲜,马丁·路德改革宗教前的欧洲处于中世纪政教合一制度,而藏族社会因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社会状态。9世纪中叶,统一的吐蕃中央王权丧失后,争逐权力的王子王孙们谁也没再能恢复往日的美梦。代之而起的教派力量,却以勃勃的生机赢得了地区性的民众。从信仰和心理的角度看,往日倾心于王朝号令的民众,都成了“爪玛洛”(吐蕃王朝解体后,东部地区有一些没有接到国王命令的战士,长期滞留在那里)战士,他们希望而等待着王室的命令,而这个命令却永远不会再来了。但是信仰不能存在真空,心理不可能让其停止运转,于是民众将往日对王朝的情感,转而投向宗教。从具体的历史环境考察,藏区自教派产生后的“主教们”并不是“政府使用的工具”,相反,他们却往往是拥有宗教影响后才获得政治权力的地方政府首脑。因而他们的现实做法也往往是让政治更好地为发展宗教服务。

1. 萨迦政权时期

萨迦派的创始人贡却杰布是有名的吐蕃最初剃度的“七试人”之一昆·鲁益旺波的后裔,此派立宗后,可谓人才辈出,“萨迦五祖”贡噶宁布(一祖)、索南孜摩(二祖)、扎巴坚赞(三祖)、萨班(四祖)、八思巴(五祖)均有成就,闻名遐迩。

从传承上看,贡却杰布早年学习宁玛派教法,后向卓弥·释迦意希学习“道果”法,以家庭形式传承,至四祖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1182~1251),声名日盛,已成集政治、宗教、经济权力于一体的地方势力。恰于此时蒙古军事帝国突然崛起北方,1211年消灭金帝国,1215年陷北京,后用兵欧洲,声威显赫。1238~1239年时,蒙古军队由大将多达那波率领攻入西藏,兵至藏北热振寺。藏人已虔信佛法,诸教派中尤以萨迦声望卓著,多达那波遂建议驻守凉州的成吉思汗孙阔端邀请萨迦教主到凉州会晤。萨班到凉州后写了著名的《告蕃人书》,劝告西藏地方政教首领,放弃抵抗,归顺蒙古。自此西藏归入中国版图,萨迦教派受到蒙古贵族优遇,成为西藏地区的实际领袖,统管政教事务。后萨班辞世凉州,八思巴被忽必烈封为国师、帝师、大

宝法王、总制院事等职衔名号，其弟恰那多杰（娶阔端女为妻）封为“白兰王”。后八思巴制蒙古新字，为忽必烈及王室传教授戒多有贡献，元王朝将乌斯藏13万户赏赐八思巴。从13世纪中叶至14世纪中叶，萨迦系统中出任元王朝帝师的就有十三四人之多。随着元王朝的衰败，萨迦政权内部矛盾也日趋激烈。后帕木竹巴兴起山南，萨迦维护了近百年的统治也为之取代。

2. 帕竹政权时期（1354年至1618年）

这一政权大体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1）发展期

帕木竹巴是达布噶举的一支，源于多吉杰波（1110~1170年）。作为政权形态的出现，是在出自山南著名的贵族朗氏家族的扎巴迥乃（1175~1255）受止贡巴邀请担任丹萨替寺主以后，扎巴迥乃集政教大权于一身。后其侄扎巴仁钦主持丹萨替寺时兼任万户长，并将赤本（ཁྲི་པོ།，万户长）改为喇本（ལྷ་པོ།，政教长官），从名称和形式完全施行政教合一。当然，此时的帕木竹巴政权还是处于帕竹万户长的地位，是西藏十三万户长之一，并不拥有对整个西藏的控制权。

（2）兴盛期（1354~1432年）

1322年，扎巴仁钦的侄子绛曲坚赞（1302~1364年）废坚赞吉而自任帕竹万户长，使帕竹政权逐步走向鼎盛时期。绛曲坚赞具有政治、军事才能，他以寡敌众，击败了萨迦本钦为首的各万户联军，占领萨迦属地，将乌斯藏大部分土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又派使者朝贡元王朝。此时元廷已趋衰微，承认此现实，封绛曲坚赞为大司徒，赐印信，令其子孙世袭。绛曲坚赞在发展农牧业，制定法律，加强政府行政管理方面颇有建树。如设立宗及宗本（རྫོང་པོ།）等基层行政单位及官员等，对西藏后期政治产生了一定影响。

自这位9岁出家、20岁任万户长的政治家、军事家辞世后，帕竹政权尚经过了一段旺盛的发展时期，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都得到良好的运行，至第五代领袖阐化王扎巴坚赞去世后，帕竹政权迅速进入颓势。

（3）衰落期（1432~1618年）

绛曲坚赞考虑到帕竹政权的长久永固，在朗氏家族内部设立政教合一的三大支柱：一为宗教首脑的丹萨替寺座主；一为握有政治大权的内邬栋第悉（འདྲེན་པོ།），袭朝廷所封阐化王；一为保证子孙繁衍的传嗣系统。前二为僧人担任，后一自然为俗人。从当时的政教形式看，这一做法是颇有远见的。然而在第六代时将第悉和座主集于一身，动摇其格局，继而引出一系列事件。六代阐化王死，其父以俗人身份代行其职11年；七世与子、妻不和，属下仁蚌贵族始侵其属地；八世虑及王位，娶妻生子，于是政、教、传嗣并而为

一；由于与帕竹重臣仁蚌巴家族联姻，八、九两世帕竹政权实被仁蚌家族扶持，成为名义的帕竹政权，实际上的仁蚌巴天下。

仁蚌巴虽然也建立了拥有一定势力的政权，经过了一百多年的统治历史，但是，此时的西藏地区仍然处在诸教派分割局面，因而我们也将这段历史归入帕竹系统。此时格鲁派业已兴起，仁蚌巴对此发展十分不利。比如1485年，在噶玛巴红帽系活佛曲扎益希的唆使下，仁蚌巴诺布桑布的两个儿子率后藏军队万余人进攻卫地，驱逐支持格鲁派并为其施主的内邬宗宗本阿旺索南伦波父子。诺布桑布的儿子措杰多吉任摄政时，于1498年起禁止格鲁派色拉、甘丹、哲蚌寺的僧人参加正月在拉萨举行的祈愿大法会。

3. 藏巴汗政权时期（1612~1639年）

1565年，重蹈前辙，如同仁蚌巴窃取帕竹权力一样，作为臣下的辛夏巴才旦多吉推翻仁蚌巴，夺取后藏大量土地。1610年左右，辛夏巴彭措南杰以后藏为据点，又控制了前藏一部分土地，称“藏巴汗”（གཙང་པོ་པོ་པོ་པོ་）。1612年，攻取澎波，基本上占领西藏。

藏巴汗政权是在矛盾和战火中度过的。1618年，藏巴汗彭措南杰以万余众攻下色拉、哲蚌等寺，杀僧俗5000余人。1633年彭措南杰死，其子噶玛丹迥旺布执政。1633年，五世达赖的强佐索南饶丹引请2000名蒙古骑兵入藏，与第巴吉雪巴的军队一起进攻藏巴汗，杀死数千人。1639年，因格鲁派邀请消灭了白利土司的固始汗突袭藏巴汗，生擒噶玛丹迥旺布。藏巴汗政权崩溃。

4. 格鲁派政权时期（1642~1951年）

以教派为基础的权力斗争是绵长而严酷的。即便是萨迦政权时期，并没有完全统辖于萨迦本钦治下。萨迦之后的一些万户长等世家与某一教派相结合同样独霸一方，不相统属。格鲁派也是在这种层次繁多的恶劣环境中成长而掌握政权的。大致分以下四个阶段：

（1）立派建寺时期（1409~16世纪）

格鲁派的正式立宗的时间被定为宗喀巴（1357~1419年）在拉萨进行祈愿大法会的1409年，这以前他已经做过许多以噶当派教理修习为基础兼收众派之长的的工作，并建其主寺甘丹寺，其势力得到迅速发展，其弟子建成哲蚌（1416年）、色拉（1418年）、日喀则（1447年）等著名寺院，由于以噶当派做基础，僧人队伍也得到迅速扩大。

（2）达赖、班禅活佛系统建立期（1578~1645年）

达赖、班禅两大活佛系统的建立有其特殊性和必然性。特殊性在于采取转世制度解决宗教继承人问题，并且用几乎是偶发的蒙古汗王赐予的尊号；

必然性在于当时错综复杂的内部、外部斗争中，不如此解决领袖继承人问题，当时的格鲁派也可能会迅速崩溃，这既是当时社会的政治要求，也是宗教要求。时代必须解决这一问题。因而，除了内部的长期复杂的斗争，中央王朝的管理外，又引进了蒙古汗王的统治，使西藏的问题更加复杂化。1578年，索南嘉措病死进京途中，采取寻找灵童形式，导出达赖喇嘛系统，即追认根敦主为一世、根敦嘉措为二世，索南嘉措为三世达赖喇嘛。1645年，固始汗赠札什伦布座主罗桑确吉坚赞以“班禅博克多”尊号，罗桑确吉坚赞死后，追认克主杰为一世，索南确朗为二世，恩萨罗桑顿珠为三世班禅，罗桑确吉坚赞为四世班禅，导出班禅喇嘛系统。从实质上看，应以灵童的寻找和确认作为转世的开始。为了方便掌握，我们将两个称号的出现作为系统的建立之始。

（3）甘丹颇章政权时期（1642~1721年）

为了格鲁派的利益和前途，五世达赖借助蒙古固始汗的军事力量消灭了藏巴汗，然而固始汗进入西藏后，很快掌握了西藏地方的权力，1642年，五世达赖也在哲蚌寺建立了甘丹颇章政权。与藏巴汗联合反对格鲁派的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十世活佛却英多吉等逃往洛扎地区，纠集部分势力，反对甘丹颇章政权，占据后藏和山南部分地方，固始汗派子丹增达赖汗前往镇压，强令噶举派寺院改宗格鲁派，进行严厉打击；噶玛噶举派也不断发动叛乱。与此同时，藏族宗教上层与蒙古汗王的斗争也日趋激烈，发生了拉藏汗和第巴桑结嘉措的斗争，第巴被杀，废止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准噶尔部侵扰西藏等一系列事件。

1720年，康熙命允禩为抚远大将军，率三路大军入藏，重创准噶尔，该部逃向伊犁。

（4）噶厦政权时期（1721~1951年）

允禩入藏，废第巴职位，设四噶伦管理西藏政务。派满汉官兵驻守拉萨，自1727年设驻藏大臣二员。1751年废除世俗藏王、郡王、贝子制度，正式建立噶厦，设一僧三俗四噶伦及译仓（秘书处）等，由达赖喇嘛掌握西藏地方政权。此种格局延续到西藏和平解放。

第一章 藏传佛教文化之初萌

(8 世纪 ~ 11 世纪)

第一节 佛教进入藏土

关于佛教何时传入藏区这一问题，通常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根据《布敦佛教史》记载：“拉脱脱日宁谢在位时年达六十，居于雍布拉主康宫顶，自天空降下一宝篋，启观之，有《宝篋经》、《忏悔百拜经》及金塔一座在焉。乃名之为‘宁保桑瓦’——‘秘要’，供奉之。此王获世寿一百二十岁。此为正法之始也。”拉脱脱日宁谢为吐蕃第二十八代王，若每代王按三十年计算，自松赞干布上推五世，即公元6世纪左右，吐蕃境内已有佛典了。自布敦·仁钦珠之后，《吐蕃王统世系明鉴》、《吐蕃王臣记》等著作均采此说。二是由于松赞干布的两位妃子——尼泊尔赤尊公主和汉文成公主都来自信佛国度，传说和史料都有两位公主入吐蕃时带有佛典和佛像等语，故而将此说成是西藏佛教的开始。

这两种说法均有一定道理，但问题的关键是将“进入”一词理解到何种程度。假如说藏土传进了藏人尚不知为何物的佛像、经书等，作为佛教传入之始，想未免勉强，因为拉脱脱日宁谢时，藏族社会尚十分闭塞，居住在雅砻河谷的悉勃野家族尚无叱咤风云的领袖出现，尚未创制新藏文。尽管吐蕃的周邻都是信仰佛教的国度，但吐蕃人尚不知天空降下的是何物。将文成、赤尊二公主进藏当作佛教传入吐蕃之开始，亦有同样问题。汉藏史籍均载文成、赤尊二公主入藏时均带有佛教典籍、佛像等物，但是，佛教的传入并不是佛教经籍和佛像的传入，尽管它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文成公主和赤尊公主带一批佛教经典和佛像到吐蕃，把它供奉起来，并不对吐蕃臣民的思想、文化和风习发生影响。

我在一些文章中说过，后世的佛教徒多将松赞干布、赤松德赞、赤热巴巾三赞普称为“三大法王”。松赞干布之所以被称之为“法王”，仿佛与迎娶文成、赤尊二公主有关，与他惊天动地的历史功勋有关。但是松赞干布时代是不具备出现法王的条件的。因为：其一，当时还没有较为完备的

佛教经典系统，也不可能有多数的翻译家通过翻译来建立这一系统。其二，尚未建立吐蕃的僧团组织，还没有一个吐蕃人成为僧人，显然松赞干布不可能受戒出家，也不可能有一定数量的轨范师为他剃度，使他具备藏土第一个法王的基本条件和机会。其三，松赞干布时期，吐蕃的宗教仍然是苯教。从敦煌文献等史料来看，松赞并没有进行过什么佛事活动，他虽然接受了或者说采用了一些佛教思想，但基本上是以传统的形式统理国政。其四，作为一代英主，松赞干布的一生仿佛没有多少时间静下心研习佛法。“松赞干布之时，父王所属民庶心怀怨望，母后所属民庶公开叛离，外戚如象雄、牦牛苏毗、聂尼达保、工布、娘布等均公开叛变。父王南日松赞被进毒者所谋弑。”南日松赞遇弑，十三岁的松赞干布即位，在叔叔伦果及其他大臣的辅佐下，率众平除乱党，开始了他伟大光辉而又繁忙的君主生活。如营造布达拉宫、建大昭寺、填卧塘湖、经略党项、讨伐吐谷浑、破白兰、逼松州、破天竺等一系列的军事政治斗争。他一面得搞建设，开疆拓土；一面得稳定内部，与诸小王会盟，平乱除害；一面得处理一系列外交事务……其五，根据松赞干布以后佛苯斗争的历史分析，亦无可能。松赞干布谢世后一百多年，赤德祖丹离世，赤松德赞即位不久，代表苯教势力的大臣玛降春巴开始禁佛。可见当时的苯教势力仍占主导地位。假如松赞干布果真称得上“法王”，一百年后他的王朝是很难掀起这种大规模的禁佛运动的。

有人认为，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作为原始宗教的苯教已不适应新的政治经济形势，所以要用一种新的宗教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其实这个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其一，原始宗教作为多神教转入一神教的过程，是与奴隶制社会的出现有关，这是因为神的一神和王的一王是相一致的，天上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地下则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王。那么，吐蕃是不是没有这样的天上的神来象征地上的王呢？不是。敦煌文献《赞普世系》中所讲是吐蕃第一世聂赤赞普是自天神而为人主，入主人间的。看来，王被抬到神的地位，并不在松赞干布时期，比这要早。吐蕃的臣民或许就在这“天神”的号召下，进行西藏高原的部落兼并战争。王的地位同样是至尊的。仿佛还没有必要立即找一个新的宗教、新的至高无上的“神”（佛）来替换，以拔高他在人间的地位。换言之，倘若松赞干布果真对弘扬佛法的事业有那么大贡献，敦煌文献和唐蕃会盟碑中不可能只字不提。唐蕃会盟碑在说到松赞干布时，依然沿袭旧号称“圣神赞普赤松赞”，并没有加上“法王”之类尊号。可见，称松赞干布为法王是后世佛教徒之所为，它与当时的历史事实是大相径庭的。

我认为,藏地佛教的传入与新藏文的创制基本上是一致的——藏族最早接受佛教理论的,或许就是那些为了创制新文字去印度国求学的“留学生们”。具体地说,是以新藏文的创制者吐弥桑布札的事业为基础。许多经典都记载吐弥去印度向婆罗门李瑾及班智达日巴僧格学习文字、声明等学问,返回吐蕃时,将印度50个字母制成藏文30个字母,并说他将《宝云经》等21种经籍翻译成了藏文。这或许有点夸张,他翻译了一定数量的佛经,这却是事实。译经的开始,标志着佛教的真正传入。早期译经的据说还有印度译师格萨拉、汉僧大天寿和尚、尼泊尔人项德尔等。显然,佛教的传入有两大有利时机和条件:其一是新藏文的创造,倘若没有新藏文的创造,它在日后的发展中就不可能获得畅行的舟楫,从而获得永久的地位;其二是它的传入恰恰是在吐蕃王朝的上升时期,经济的大繁荣,军事的大发展,文化的大吸收,为它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人文氛围。

第二节 藏族典籍文化的开端

一、“七试人”与桑耶寺的建立

随着吐蕃王朝在四境军事上的胜利和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吐蕃本地的佛教僧人的活动也日益增多。一直到这些僧人的代表在政治上获得胜利,吐蕃地区的佛教徒大体经历了以下一些过程。

(一)由表及里——由流浪到驻足。从松赞干布到赤德祖赞(704~755年在位),四代人,就佛教而言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此期间也修了许多寺庙和神堂佛殿,比如像大昭寺、小昭寺等,都为信仰佛法的王妃们提供了方便,因为当时的赤尊公主、文成公主,以及后来进藏的金城公主等都或深或浅地崇佛、信佛。据史书记载,当时包括松赞干布在内的藏王们都对佛法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与此同时,以苯教为代表的藏族本土文化也与佛教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此消彼长,旷日持久,有了第一禁佛运动,有了寂护和莲花生大师的进藏。当时还没有藏族的僧人。莲花生进藏以后深得王室的宠信,赤松德赞便决定在桑耶建一座佛教寺院,由莲花生选择寺址。此一工程得到了王朝的高度重视,赤松德赞、莲花生、寂护,以及众大臣都参加了这一奠基仪式。桑耶寺的建造和开光时间典籍所载和当代学者的研究不尽相同,有767年建造,771年竣工;763年始建,774年竣工;787年始建,797年竣工;763年始建,766年竣工;780年始建,787

年竣工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 779 年竣工比较入理。显然这一时间仍然是十分重要的。一般将桑耶寺当作藏区第一个佛教寺院，因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我以为其重要者，主要在于这一寺院的建立标志着佛教正式立足吐蕃。桑耶寺的建立据说是莲花生依照古印度摩揭陀的欧达菩提寺为蓝本建造（此在后文将叙述，在此不表），不但是当初，其象征意义在今天也是别具一格。开光之日，同样是赤松德赞、莲花生、寂护，以及众大臣都前来参加。《贤者喜宴》如此描写道：“在吉祥桑耶寺，当在举行开光喜宴时，在措莫古的中央，那个生着莲花主茎之处，赞普坐于金座之上，可意的五位妃子盛装而坐。所供养的所有译师和班智达都在讲经说法。所有主要的执法大臣环列于座位之后。如是，赞普属下的幸福百姓，在卫藏、阿里等一切地方，都在集会庆祝，以各种饮食和享用之物，使一切欲望得到满足。”据《巴协》（桑耶寺志）、《贤者喜宴》等史书记载，当时的场面的确热闹非凡。

桑耶寺建成开光不久，就有七名吐蕃贵族子弟随寂护大师出家，藏文典籍中称为“预试七人”（ལད་མི་བདུན།），汉籍多译为“七试士”或“七试人”、“七觉士”等，按藏文原意仍译为“七试人”为好。当然此事也有别的一些说法，有些书籍认为“七试人”出家的时间在桑耶寺开光之前不在开光之后，有的书则记有“七试人”的出家与开光同时。

桑耶寺的建立标志着藏区有了第一个寺院，“七试人”的出家标志着藏区有了第一批僧人，同样，“七试人”的受戒便是藏区僧人的第一次剃度。《吐蕃王臣记》载：“庆祝开光法会完成后，感觉到佛教的兴盛，是与僧伽有关的，因此为了实验藏人是否能守护出家的学处起见，他们在丁未年到印度迎请那与西藏适合的根本四部中的说一切有部的比丘十二人。由精通五明学处希哇措（寂护）作亲教师，而给那生起愿取涅槃的最胜意乐的应试七人传授那佛教的根本——别解脱戒。”这第一批出家人是：巴赛囊、桑希、玛仁青乔、昆鲁益旺波、巴赤桑、恩兰嘉哇却央、白惹杂那。“七试人”的姓名有些书籍所载也不完全一样。但是，自“七试人”之后，由于出家人的生活费用在国库中领取，生活有保障，同时也是时代的思想文化的强烈要求，陆续有不少人出家。《贤者喜宴》载：此时有“长妃赤洁姆赞及苏赞姆杰等一百人出家，巴热丹任她们的亲教师。总之，其时有三百人出家。”“此后比丘、沙弥广为发展，并自印度萨霍（ཟཱ་ཁོ།）、迦湿弥罗、中印度及汉地等处迎请来许多标准的大班智达。一些精通翻译的人，将印度、汉地和于阗等地区的佛经，凡是能得到的大部分译到吐蕃。”

显然，完整的寺院、僧侣、典籍、宗教仪轨等的出现，大大地推动佛

教在吐蕃地区的发展。但是此时的佛教徒并没有多少政治地位。他们中的领袖应是堪布，像菩提萨埵、莲花生等，政治上并没有权力。可是佛教以它巨大的思想、理论力量给吐蕃社会吹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吐蕃社会的一切也在这一股风中起着变化。不久，赞普颁布诏令制定佛教的教戒法规，对其属民也进行了法律调整：犯法者男不挖眼，女不割鼻；没有死刑。一切众生听从王命，赞普与属民都要对出家人顶礼供奉。为了更好地奉行佛法，并让大臣以下所有首领都为此持剑发誓。并兴建兴佛盟誓碑。碑文曰：

逖些及札玛之诸神殿，建立三宝所依处，奉行缘觉之教法。此事无论何时均不离弃；所供养之资具，均不得减少，不得匮乏。自今而后每代子孙均需按照赞普父子所做这盟誓发愿。其咒誓书词，不得弃置，不得变更。祈请一切诸天、神祇、非人，同来作证。赞普父子与小邦王子，诸论臣工，与盟申誓。此诏敕盟书之详细节目文字正本，存之于别室。

从此盟誓碑文我们可看到赤松德赞对兴佛的决心和重视程度。

（二）由外僧到宫廷——由一般僧徒到权势人物。虽然一些贵族子弟成为僧人，但是在早期他们的身份仍然是一般僧人。可是这种状态并没有维持多久，僧人的地位很快得到提升。菩提萨埵死后，巴益希旺波（巴赛囊出家后的名字）升任堪布，可以参加赞普的小御前会议，小御前会议前还设立一个专门的宗教会议，赐给堪布以大金字告身。如此僧人的地位变了，他具有国家管理人员的资格。赞普还赐给寺院民户 150 户，给每名僧人 3 户属民；每月给堪布青稞 75 克（西藏计量单位，20 升为一克），还供给酥油、衣服、马匹、纸张、食盐等；大修行者、学经僧等都有国家相应的供养。僧人阶层逐步成为实质的农奴主阶级。在赤热巴巾时将其推向极限。当时规定：凡对僧人恶目相视者抉其目，恶指相指者断其指，恶言诋毁者拔其舌，偷盗寺院僧人财产者，罚款 80 倍。

（三）由僧权到政权——由文化斗争到政治斗争。僧人早期的追求可以说仍然是为了“僧权”，为了其宗教利益，斗争的层面仍然在于思想文化范畴之内。随着僧人在宫廷中政治地位的提高，佛苯的斗争也由原来的思想文化斗争异化为残酷的政治斗争。最为典型的是赤热巴巾的老师贝吉云丹。他被热巴巾被任命为大相，主持政教事务。公元 822 年唐蕃会盟时，在吐蕃方面除赞普以外，他是首席官员，作为僧相他立于赞普之后，而其

他官员立于台下。会盟时，唐和吐蕃大臣十余人对坐，百余名酋长坐在坛下，而作为大相的钵阐布贝吉云丹则首先升坛告盟。当歃血时，因为他是僧人而不歃，盟后以浮图重为誓，饮郁金水，与使者互相庆贺。可是曾几何时，反佛的大臣们设计除掉王兄藏玛，迫使其出逃，后被斩杀剥皮植草，进行陈列，让众人观览。曾权倾一时的崇佛大臣贝吉云丹也转瞬之间成了权力的牺牲品。

二、翻译事业的蓬勃发展

吐蕃的翻译事业大致起于吐弥桑布札，而大规模的译经是在桑耶寺建立之后。吐蕃的译经方法是十分科学的，他们先派子弟去印度留学，学成后回到吐蕃，再请印度精通五明的班智达到吐蕃来共同翻译。这样的好处是许多不懂的文词，可以及时请教，及时商量，因此其翻译是准确而可靠的，是有质量的。故而今人在研究藏译佛经时无不为藏人翻译的“信、达、雅”而倍感心服。由于历史的原因，藏人翻译事业一开始便分两头进行，一是翻译印度的佛经，比如《十万般若颂》等；一是翻译汉地的佛经著作。《贤者喜宴》如此记述当时的翻译情况：

《大巴协》有一种说法是，吐蕃地区首先翻译了汉地佛经（此针对巴热丹在吐蕃首译《十万般若颂》而言）。印度佛典中之密宗三续部，耽于酒肉，不适于吐蕃，故不译。但说一切有部、分别说一切有部，其内容是阐明因果的，适合于吐蕃的情况，遂译之。请益希旺波翻译了四阿含经中的《长阿含经》和全部的《譬喻部》，又翻译了《阿毗达摩之声闻俱舍》等。此时还翻译了律藏、经藏等方面的著作。据有些书籍记载，此时的译师有千人之众，著名的有九大译师；“千人之众”或极言其多，据《布敦佛教史》辑录，当时来自外地的大班智达有9人，班智达有92人。我以为这是可信的。因为布敦辑录是依据他所编辑的《大藏经》目录统计的，没有译品则无此人，一般是不会错的。这92位来藏土弘法的班智达在阿底峡前的30位是：

1. 阿闍黎辛达若肯达，藏译“细哇措”，汉译“寂护”；
2. 白玛迥乃，即莲花生；
3. 持密师达摩根底；
4. 毗玛那弥遮，即“无垢友”；
5. 桑杰桑哇，“佛密”；
6. 桑耶寺的开光师辛底嘎坝，即“细哇领波”，汉译“寂藏”；
7. 毗休达舍哈，即“朗达僧格”，汉译“清净狮子”；
8. 嘎玛拉细拉，即“白玛慈诚”，汉译“莲花戒”；
9. 印度阿闍黎古萨惹；
10. 婆罗门“西嘎惹”；
11. 尼泊尔的西那曼珠；
12. 婆罗门阿伦达；
13. 嘎勒雅弥遮，即格卫协年，汉译“善友”；
14. 枳纳弥遮，即嘉哇协业，汉译“胜友”；